

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 ——以滁州市为例

陈晓华^{1,2}, 张鑫玲^{1,2}

(1.安徽建筑大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2.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22)

摘 要:构建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 2010—2019 年滁州市各区县(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水平、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十年滁州市乡村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耦合度处于上升趋势,协调发展态势良好;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亚类型也存在异质性;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受地理交通区位、区域人口素质、公共资源配置、生活消费水平、政府财政投入的影响显著,两两交互作用增强。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发展;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F29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63(2021)04-0026-08

DOI: 10.19747/j.cnki.1009-2463.2021.04.004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It:

Taking Chuzhou City as an Example

CHEN Xiaohua^{1,2}, ZHANG Xinling^{1,2}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 230022, China;

2. Anhui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Hefei 230022,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the geographic detector model,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rural development and new urbanization, analyzes the coordination level,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districts of Chuzhou from 2010 to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coupling degree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Chuzhou has been on the rise in the past 10 years, and the momentum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good. 2) There are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rural development and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subtype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are also heterogeneous. 3)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rural development and new urbanization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geographic transportation location, regional population quality, 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 living consumption level, and government financial investment, with enhanced effe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ny two of them.

Key words:rural vitalization; rural development; new urbaniz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1],充分表明新形势下城乡协同

发展的迫切需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协同推进是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是

收稿日期:2021-06-1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基于精明收缩的传统村落功能更新与空间活化研究——以皖赣徽文化核心区为例”(51778002);安徽省高校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基于精明收缩的皖北乡村空间重构机制、路径及规划策略研究”(KJ2018A0504)

作者简介:陈晓华(1964—),男,安徽贵池人,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张鑫玲(1996—),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区域发展与规划及空间治理等学科领域的重要课题。

国内外有关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成果颇丰。国外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了城乡二元论^[2]、核心边缘理论等,从城乡分割^[3]转向城乡联系^[4-5]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主要从城乡融合的视角研究其发展困境^[6-7]、路径选择^[8-9]及发展特征^[10-11]等,且多为市域层面的研究。蒋正云和胡艳运用主成分分析、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及其优化路径^[12];张俊忠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水平耦合协调水平及障碍因子^[13];冯雪彬和张建英揭示了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程度及路径^[14]。既有研究多为市域层面的探索,而具体到县级单元较少,其影响因素定量研究模型多为最小二乘法、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影响因子的选择较为主观。

以滁州市各区县(市)作为研究单元,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揭示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协同关系,采用地理探测器探究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试图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角度探寻滁州市城乡发展规律,为区域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滁州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评价方法

滁州市地处合肥都市圈、南京都市圈交汇处,地貌为江淮丘陵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辖两区、四县、两个县级市。国土总面积约为13 398平方千米。截至2019年末,滁州市总户籍人口455.4万,其中乡村人口约为343.7万,地区生产总值约占安徽省生产总值的7.8%,是一个农业人口密度大、经济发展迅速的区域,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协同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选取2010—2019年滁州市各区县(市)主要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滁州市统计年鉴》,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替代。研究所使用的滁州市行政区划信息、县级单元矢量边界分别来源于民政部全国行政区划信息查询平台、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平台。

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是一个随时代变化的长期的动态过程,其内涵也在不断完善与丰富。二者互为依托、彼此渗透,其耦合协调度的变化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生态环境宜居等国计民生的重要内容。

(一)指标体系构建

国内外关于乡村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的相关文献还较少,现阶段已有乡村发展理论^[15-16]应用德尔菲法以专家打分的方式筛选其目标层,主要包括产业发展、生活富裕、农业机械化、治理有效、生态宜居等方面。乡村产业发展体现在农业产值、农作物多元化程度等方面,乡村居民生活富裕体现在农村人均收入、就业人员数占比、消费水平等方面,农业机械化水平体现在机械化耕作水平、农作物灌溉程度等方面,乡村治理有效程度体现在政府改厕、改水以及水土流失等问题的治理水平,乡村生态宜居程度体现在化肥、农药的使用、危房改造情况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区别于过去过度关注城市土地和人口无序扩张的传统城镇化,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和发展质量问题。根据近年相关研究成果^[17-18],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包括人口、经济、社会、土地、生态等方面。人口城镇化主要关注城镇化率、人口结构、人口素质等;经济城镇化主要关注产业结构、经济投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社会城镇化主要关注社会资源配置均等化、居民生活方式转变等;土地城镇化则主要关注城镇建设情况、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等;生态城镇化主要关注森林覆盖、社会“三废”治理情况等。

考虑到滁州市乡村与城镇建设的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结合科学、系统、可操作性等原则,从以上十个方面选取22个指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为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采用熵值法计算权重,采用极值法对滁州市2010—2019年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滁州市指标数据的量纲、计量单位之间的影响,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指标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B_{ij} = (A_{ij} - \min A_{ij}) / (\max A_{ij} - \min A_{ij}) \quad (1)$$

负向指标:

$$B_{ij} = (\min A_{ij} - A_{ij}) / (\max A_{ij} - \min A_{ij}) \quad (2)$$

其中, A_{ij} 为原始数据, B_{ij} 代表指标的标准化值。

第二步,计算滁州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的比重,即:

$$C_{ij} = B_{ij} / \sum B_{ij} \quad (3)$$

其中, C_{ij} 表示第 j 个样本所占比重。

第三步, 计算各指标熵值, 即:

$$S_j = \frac{-\sum_{i=1}^n (C_{ij} \times \ln C_{ij})}{\ln n} \quad (4)$$

其中, S_j 表示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n 为评价样本数。

第四步, 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即:

$$F_j = \frac{(1 - S_j)}{\sum_{j=1}^m (1 - S_j)} \quad (5)$$

其中, F_j 表示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m 代表指标个数。由公式(1)—公式(5)计算得出滁州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各评价指标所占权重(见表 1)。

表 1 滁州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结构指标层	具体指标	指标方向	权重
新型城镇化(H_x)	人口城镇化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正向	0.119 2
		每万人中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人)	正向	0.037 2
	经济城镇化	第三产业占比(%)	正向	0.011 5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正向	0.038 0
	社会城镇化	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床/万人)	正向	0.068 8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正向	0.085 1
	土地城镇化	公路密度(公里/万人)	正向	0.068 0
		建筑业产值比重(%)	正向	0.062 0
	生态城镇化	森林覆盖率(%)	正向	0.047 8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正向	0.014 2
乡村发展(H_y)	产业发展度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万吨)	负向	0.016 5
		作物多元化(%)	正向	0.038 4
	生活富裕度	农林牧副渔产值占比(%)	正向	0.049 3
		农村人均总收入(元/人)	正向	0.065 9
	农业机械化	农村每万人从业人口数(人)	正向	0.012 6
		农村人均用电量(kw/人)	正向	0.066 7
	治理有效度	农业机械化水平(kw/hm ²)	正向	0.056 6
		农作物灌溉率(%)	正向	0.026 4
	生态宜居度	农村治理水土流失面积(千公顷)	正向	0.053 2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正向	0.018 9
		每公顷农作物化肥施用量(t/hm ²)	负向	0.009 6
		每公顷播种作物农药使用量(t/hm ²)	负向	0.034 0

将各项指标与权重相乘累加, 可以得到滁州市 2010—2019 年各行政单位乡村发展水平(H_y)和新型城镇化水平(H_x)。

$$H = \sum B_{ij} * F_j \quad (6)$$

(二) 耦合协调度模型

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作为复合系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采用耦合协调度反映乡村发展与新

型城镇化整体“协同”效应, 以期有效地判别两者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19], 即:

$$C = [(H_x H_y) / (H_x + H_y)^2]^{\frac{1}{2}} \quad (7)$$

其中, C 代表耦合度, H_x 为新型城镇化评价得分, H_y 为乡村发展评价得分。

$$T = \alpha H_x + \beta H_y \quad (8)$$

其中, T 为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发展

度, α 、 β 分别是待定权重,考虑到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本研究中同等重要,因而取 $\alpha = \beta = 0.5$ 。

$$D = \sqrt{CT}$$

(9)

其中, D 为耦合协调度。

学术界关于耦合协调度的分类存在着许多分歧。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20],结合滁州市实际情况,将耦合协调度分为四个层次(表 2)。

表 2 耦合协调度类型划分标准

类型	数值	子类型	耦合协调类型
高级协调	$0.8 \leq D < 1$	$H_y - H_x > 0.03$	新型城镇化滞后
		$H_x - H_y > 0.03$	乡村发展滞后
		$ H_x - H_y \leq 0.03$	高级协调
中级协调	$0.7 \leq D < 0.8$	$H_y - H_x > 0.03$	新型城镇化滞后
		$H_x - H_y > 0.03$	乡村发展滞后
		$ H_x - H_y \leq 0.03$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0.6 \leq D < 0.7$	$H_y - H_x > 0.03$	新型城镇化滞后
		$H_x - H_y > 0.03$	乡村发展滞后
		$ H_x - H_y \leq 0.03$	初级协调
濒临失调	$0 \leq D < 0.6$	$H_y - H_x > 0.03$	新型城镇化受阻
		$H_x - H_y > 0.03$	乡村发展受阻
		$ H_x - H_y \leq 0.03$	濒临失调

(三)地理探测器模型

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识别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及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状况,评估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子 Z_1 和 Z_2 共同作用时是否会增加或减弱对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解释,或这些因子对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是否相互独立,具体公式如下^[21]:

$$q = 1 - \frac{\sum_{h=1}^L N_h \sigma_h^2}{N \sigma^2}$$

(10)

其中, L 为变量的分层,即分类或分区; N_h 和 N 分别为层 h 和全区的单元数; σ_h^2 、 σ^2 分别为因变量在层 h 和全区的方差; q 表示某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大小,其值域为 $[0, 1]$, q 值越大说明自变量因子对因变量的解释力越大。当 $q = 0$ 时,表明因子完全不影响因变量;当 $q = 1$ 时,表明自变量因子决定因变量的空间分布。

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来识别影响二者耦合发展的关键要素。首先分别计算两种因子 Z_1 和 Z_2 对 D 的 q 值 $q(Z_1)$ 和 $q(Z_2)$, 计算它们交互时的 q 值 $q(Z_1 \cap Z_2)$, 并对 $q(Z_1)$ 、 $q(Z_2)$ 与 $q(Z_1 \cap$

$Z_2)$ 进行比较。根据已有研究^[21]可知,两个因子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以下几类(见表 3)。

表 3 地理探测器交互作用类型

判据	交互作用类型
$q(Z_1 \cap Z_2) < \text{Min}(q(Z_1), q(Z_2))$	非线性减弱
$\text{Min}(q(Z_1), q(Z_2)) < q(Z_1 \cap Z_2) < \text{Max}(q(Z_1), q(Z_2))$	单因子非线性减弱
$q(Z_1 \cap Z_2) > \text{Max}(q(Z_1), q(Z_2))$	双因子增强
$q(Z_1 \cap Z_2) = q(Z_1) + q(Z_2)$	独立
$q(Z_1 \cap Z_2) > q(Z_1) + q(Z_2)$	非线性增强

二、滁州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变化及其空间差异

通过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 2010—2019 年滁州市乡村发展水平、新型城镇化水平、乡村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总体得分(见图 1)。

滁州市乡村发展水平在 2010—2019 年期间较为稳定,处于 0.3 与 0.5 之间,10 年时间增长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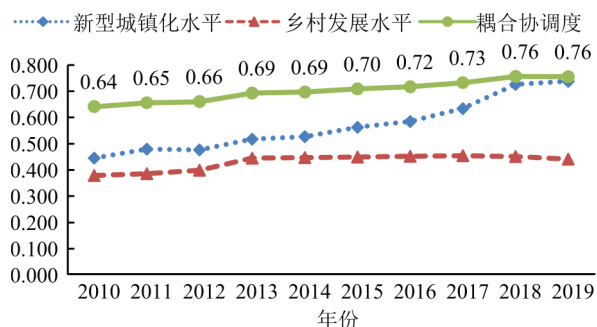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发展水平、新型城镇化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

0.75,上升趋势缓慢。同期滁州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稳步上升,增长了0.293,是乡村发展水平增长值的四倍,增长迅速。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也逐年上升,滁州市整体由初级协调状

态转为中级协调状态,耦合协调度值增长0.116。总体来看,滁州市乡村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整体耦合度处于上升趋势,二者同步发展,但存在乡村发展水平和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不匹配的问题。

滁州市各县级行政单元2010—2019年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均值最高为琅琊区,其余依次为南谯区、天长市、全椒县、明光市、来安县、凤阳县、定远县,耦合协调度都在0.6以上,均处于初级协调及以上的阶段。10年间琅琊区、南谯区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有小幅波动,其中琅琊区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为0.049,南谯区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为0.042;定远县耦合协调度最低,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为0.027(见表4)。

表4 2010—2019年滁州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

行政单元	年份										综合	排名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琅琊区	0.795	0.808	0.810	0.823	0.819	0.821	0.825	0.804	0.844	0.809	0.816	1
南谯区	0.747	0.740	0.740	0.756	0.760	0.754	0.756	0.781	0.774	0.782	0.760	2
来安县	0.674	0.668	0.665	0.659	0.653	0.655	0.664	0.648	0.655	0.652	0.659	6
全椒县	0.723	0.727	0.722	0.713	0.709	0.706	0.693	0.690	0.671	0.677	0.703	4
定远县	0.614	0.614	0.614	0.624	0.626	0.635	0.641	0.635	0.628	0.640	0.627	8
凤阳县	0.646	0.649	0.635	0.639	0.640	0.634	0.629	0.635	0.632	0.637	0.638	7
天长市	0.723	0.715	0.708	0.706	0.706	0.704	0.695	0.703	0.696	0.700	0.706	3
明光市	0.649	0.657	0.667	0.652	0.660	0.667	0.674	0.669	0.675	0.679	0.665	5

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呈由中东北高、四周低转向中部高四周低的分布格局,空间上也形成了以琅琊区为核心的辐射核心。各区县(市)亚类型划分上也存在异质性,新型城镇化滞后型位于滁州市西部、北部,如定远县;乡村发展滞后型位于东北向呈带状分布,如琅琊区、南谯区、全椒县、天长市。滁州市的高级协调类型都为“高级协调—乡村发展滞后型”,中级协调类型都为“中级协调—乡村发展滞后型”;在滁州市初级协调类型中,“初级协调—乡村发展滞后型”“初级协调—新型城镇化滞后型”“初级协调—协调发展型”三类均匀分布(见图2)。

综合来看,滁州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处于协调状态且有上升趋

势,乡村发展滞后型较新型城镇化滞后型、协调发展类型更多,存在城乡发展不匹配的情况,这将是未来滁州市实现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短板。

三、滁州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

参考相关文献,综合考虑滁州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状况,以滁州市2010—2019年8个行政单元为样本研究区,以滁州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为因变量,从地理交通区位、区域人口素质、公共资源配置、生活消费水平、政府财政投入五大类中选取10个指标作为影响因子备选变量(见表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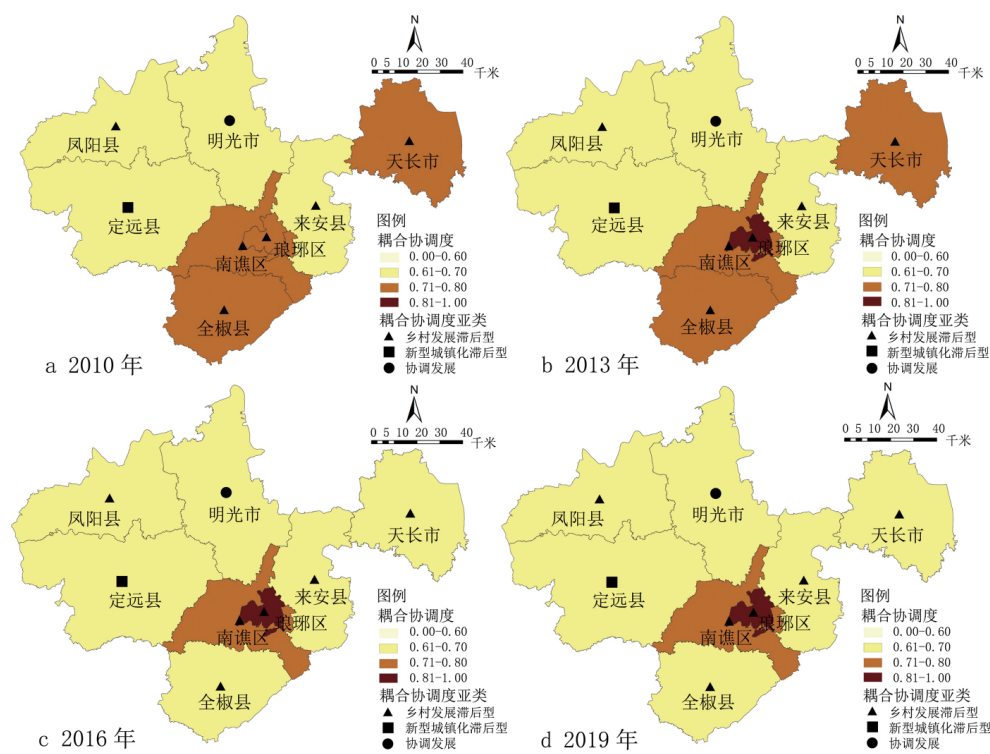


图 2 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类型及空间格局变化

表 5 滁州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	单位
地理交通区位	距南京距离(Z_1)	公里
	距合肥距离(Z_2)	公里
区域人口素质	城乡中小学生在生人数比(Z_3)	%
	城乡人口比(Z_4)	%
公共资源配置	市区卫生机构与村卫生室人员数比(Z_5)	%
	城乡投递段道长度单程比(Z_6)	%
生活消费水平	城乡普通电话用户比(Z_7)	%
	城乡居民用电量比(Z_8)	%
政府财政投入	农业与非农业产值比(Z_9)	%
	政府农业支出占比(Z_{10})	%

利用 SPSS26.0 统计软件中 Pearson 相关系数分析影响因素相关关系的强弱情况,结果显示:距南京距离(Z_1)、城乡中小学生在生人数比(Z_3)、农业与非农业产值比(Z_9)与耦合协调度值成负相关;城乡人口比(Z_4)、市区卫生机构与村卫生室人员数比(Z_5)、城乡普通电话用户比(Z_7)、城乡居民用电量(Z_8)、政府农业支出占比(Z_{10})与耦合协调度值成正相关;距合肥距离(Z_2)相关系数值为 0.047, p 值为 0.744, 大于 0.05, 城乡投递段道长度单程比(Z_6)相关系数为 0.110, p 值为 0.446, 大于 0.05, 表明这两个因子与

耦合协调度的相关性很弱,因而剔除。最终确定影响滁州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 8 个主要因子(见表 6)。

表 6 滁州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主要影响因子

因子参数	相关系数	P 值
Z_1	-0.660**	0.000
Z_3	-0.792**	0.000
Z_4	0.461**	0.001
Z_5	0.635**	0.000
Z_7	0.815**	0.000
Z_8	0.916**	0.000
Z_9	-0.569**	0.000
Z_{10}	0.607**	0.000

注: * $p < 0.05$, ** $p < 0.01$ 。

地理探测器的探测结果显示,滁州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子作用强弱表现为:距南京距离(Z_1)>城乡居民用电量比(Z_8)>城乡普通电话用户比(Z_7)>城乡中小学生在生人数比(Z_3)>农业与非农业产值比(Z_9)>政府农业支出占比(Z_{10})>市区卫生机构与村卫生室人员比(Z_5)>城乡人口比(Z_4)(见表 7)。

表 7 滁州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影响因子作用强度

$Z_i \cap Z_j$	$q(Z_i)$	$q(Z_j)$	$q(Z_i \cap Z_j)$
$Z_1 \cap Z_3$	0.934	0.526	0.948
$Z_1 \cap Z_4$	0.934	0.273	0.936
$Z_1 \cap Z_5$	0.934	0.473	0.943
$Z_1 \cap Z_7$	0.934	0.672	0.950
$Z_1 \cap Z_8$	0.934	0.807	0.982
$Z_1 \cap Z_9$	0.934	0.511	0.981
$Z_1 \cap Z_{10}$	0.934	0.498	0.948
$Z_3 \cap Z_4$	0.526	0.273	0.635
$Z_3 \cap Z_5$	0.526	0.473	0.693
$Z_3 \cap Z_7$	0.526	0.672	0.758
$Z_3 \cap Z_8$	0.526	0.807	0.873
$Z_3 \cap Z_9$	0.526	0.511	0.792
$Z_3 \cap Z_{10}$	0.526	0.498	0.771
$Z_4 \cap Z_7$	0.273	0.672	0.748
$Z_4 \cap Z_8$	0.273	0.807	0.832
$Z_4 \cap Z_9$	0.273	0.511	0.567
$Z_4 \cap Z_{10}$	0.273	0.498	0.588
$Z_5 \cap Z_7$	0.473	0.672	0.746
$Z_5 \cap Z_8$	0.473	0.807	0.872
$Z_5 \cap Z_9$	0.473	0.511	0.653
$Z_5 \cap Z_{10}$	0.473	0.498	0.616
$Z_7 \cap Z_8$	0.672	0.807	0.817
$Z_7 \cap Z_9$	0.672	0.511	0.862
$Z_7 \cap Z_{10}$	0.672	0.498	0.849
$Z_8 \cap Z_9$	0.807	0.511	0.950
$Z_8 \cap Z_{10}$	0.807	0.498	0.903
$Z_9 \cap Z_{10}$	0.511	0.498	0.711

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不是单一影响因素的作用结果,而是多个影响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将结果与表 3 对照,结果显示,滁州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中任意两个交互作用强度大于单个作用强度,两两交互的类型均属于双因子增强型。只有区域人口素质与公共资源配置交互($Z_4 \cap Z_5$)和区域人口素质与政府财政投入交互($Z_4 \cap Z_9$ 、 $Z_4 \cap Z_{10}$)的 q 值低于 0.6,对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的解释力相对较弱,其余 q 值均高于 0.6,解释力较强。

四、结论与讨论

首先,滁州市乡村发展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均呈稳步上升态势,二者耦合协调度处于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特征,其亚类型划分也存在空间异质

性。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变化及其空间差异受到地理交通区位、区域人口素质、公共资源配置、生活消费水平、政府财政投入等方面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

其次,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互为依托,乡村发展离不开新型城镇化的辐射和带动,新型城镇化向集约型发展并着力于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空间效应,为乡村发展提供发展契机、物质基础和技术人才。二者协同推进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合理利用地理交通区位、均衡公共资源配置、提高生活消费水平、切实提高人口素质、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是实现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关键。

再次,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受周边城市影响,未来应从更大的区域研究周边城市影响。数据来源为滁州市面板数据,可以进一步采用实地调研来细化数据,完善评价指标的丰富度和真实度,以更加全面、深刻地揭示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程度及其影响因素。此外,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是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D/OL]. [2017-10-27]. 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 [2] LEWIS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954, 22(2):139-191.
- [3] TORREGGIANI D, DALL'ARA E, TASSINARI P. The urban nature of agriculture: bidirectional trends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J]. Cities, 2012, 29(6):412-416.
- [4] AHMAD M, KHAN Z, ANSER M K, et al. Do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mitigate th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cross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s? [J].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2021, 27:679-697.
- [5] BELANCHE D, CASALÓ L V, RUBIO M Á. Local place identity: A comparison between residents of rural and urban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 82:242-252.

(下转第 110 页)

联系,并促进了零售业务的发展。然而,并不是所有零售店的管理者都认可建立起个人关系的重要性,取决于社区商业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与理念。城市社区商业的合作对象不仅局限于同行之间,还涉及供应链的价值整合,以及与政府、小区、居民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形成紧密的合作平台。

四、结语

借鉴零售社区功能的测量要素框架,基于聚集人群、社会规范、社会化和社区意识等四个社会功能要素,对 12 家传统商超门店进行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呈现公共危机前后商超的社会化行为及特征,解释以商超为代表的城市社区商业执行社会功能时的内在逻辑与机制,指出社区商业社会功能的重塑价值,并从实际运营出发提出城市社区商业重塑社会功能的行为选择。将零售社区功能的研究成果放在中国社会情境中进行检验,真实呈现危机前后城市社区商业在执行社会功能时的行为变化及特点。在分析城市社区商业社会化行为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提出危机事件后城市社区商业社会功能重塑的意义和具体路径。

公共危机的发生突显了传统社区商业社会功能的价值,其行为的改变不仅为了应对当下或未

来的突发事件,还可以通过社会功能重塑增加零售机构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理解,真正发掘城市社区共享价值,实现现代转型发展。

注释:

① 材料来源于 F 市商务局等政府部门网站。

参考文献:

- [1] ARNOLD T J, BRIGGS E, LANDRY T D,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retailer community function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13, 21 (3): 243-255.
- [2] 吕秋颖. 社会功能驱动的中国传统零售业态转型模式研究[J]. 湖南社会科学, 2020(5): 73-78.
- [3] SRICHOOKIAT S, JINDABOT T. Small family grocers' inherent advantages over chain stores: a review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2017, 45(4): 446-462.
- [4] HAVIGHURST R J.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of the aging [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52, 279 (1): 11-17.
- [5] 张桂蓉. 企业社区参与: 外在压力抑或内在需求[J]. 国外理论动态, 2015(10): 127-134.
- [6] 武小龙. 新中国城乡治理 70 年的演进逻辑[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 41(2): 77-86.
- [7] 陈晓华, 姚林. 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 基于城乡关系的视角[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8): 1958-1971.
- [8] 陈肖飞, 姚士谋, 张落成.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乡统筹的理论与实践问题[J]. 地理科学, 2016, 36 (2): 188-195.
- [9] 刘天翌, 刘沛林, 王良健.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古村镇保护与旅游发展路径选择: 以萱洲古镇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1): 133-145.
- [10] 刘春芳, 张志英. 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 新型城乡关系的思考[J]. 地理科学, 2018, 38(10): 1624-1633.
- [11] 尹鹏. 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特征、机制与路径研究[D]. 沈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 [12] 蒋正云, 胡艳. 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机制及优化路径[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 (3): 702-721.
- [13] 张俊忠. 河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10): 204-211.
- [14] 冯雪彬, 张建英. 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路径研究[J]. 农业经济, 2020(10): 23-25.
- [15] SUVU H. Revisi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sation: interconnected farming practices driving rural development at the farm level[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9, 71: 36-45.
- [16] 王向阳, 谭静, 申学锋. 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理论框架与政策思考[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10): 61-67.
- [17] 黄茂兴, 张建威. 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福建省为例[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40-54, 169-170.
- [18] 邓静, 徐邓耀, 周光美, 等. 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 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3): 278-286.
- [19] 姜海宁, 张文忠, 余建辉, 等. 山西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空间耦合[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2): 269-283.
- [20] 徐维祥, 李露, 周建平, 等.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及其驱动机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9): 2044-2062.
- [21] 王劲峰, 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J]. 地理学报, 2017, 72(1): 116-134.